

# 汉武帝统战策略的儒道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张 勇

(西安财经学院 文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为发掘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统战工作的指导价值, 通过对汉武帝时期统战活动的历史复原, 揭示出汉武帝统战活动的理论依据: 儒道思想中人本主义的人性观、情理和谐的社会观与人格理想、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观。汉武帝成功的统战策略启示我们, 重视文化创新、以人为本、尊重历史要求的文化观与辩证全面的方法论是全球化时代统战工作的恰当原则。

**关键词:**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汉武帝; 统战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3-0063-04

儒道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魂魄所在。它们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 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其中统战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儒道思想直接开启了中国古代的统战思想与策略。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版图基本成熟的特殊历史时期, 今天我们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观察这一时代的历史活动, 令人骄傲的不仅是汉武帝的统战成就, 而且其统战活动的特点也让今人深受启发。

## 一、儒道思想与中国古代的统战文化

汉武帝时代的统战思想与策略基本上属于先秦儒道思想支撑下的政治文化, 它不仅具有儒道思想的基本性格, 而且深刻反映了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的政治追求。

从统战视角看, 儒道思想中的“天下”观念是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滥觞。当中原处于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之时, 成书于此时的《易传》就说: “刚柔交错, 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sup>[1]</sup>“化成天下”表达了先贤思想的统战动机。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天下”一词的意涵中隐藏着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先见; 同时, 周代既有的五服制度也已经先天地在儒家的“天下”观念中构造了以和谐为目标的等级制的政治框架。

与儒家相比, 道家罕言“天下”, 但《庄子·天下》以其深刻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观念的另一极。《庄子》中的“天下”仍然是政治性的话语, 在庄子看来, 天下之所以不能一统, 其根本原因在于天下的人以片面之见为好恶, 不能洞察天下之道的全面性、自然性。《庄子·天下》的政治文化启示是十分丰富的, 它高扬理性的冷峻力量, 但又以一种有倾向性的、追求超越的相对主义保持了难得的开放胸怀<sup>[2]</sup>。《庄子·天下》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形态是开放的、自治的、理性而追求和谐的。这种政治文化精神是中国统战思想的宝贵资源。

当追溯到儒道思想的根源时, 我们将会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基的儒道思想在如下 3 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了汉武帝时代、乃至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统

收稿日期: 2009-11-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005)

作者简介: 张 勇(1971-), 男, 陕西汉中, 讲师, 历史学博士。

战思想与策略。

第一, 人本主义的人性观。人性力量的觉醒是周代文明的伟大标志, 对人的道德力量与身体关切成就了儒道两家对人性的本质理论。儒道两家对人类的本来状态主张相反的宇宙图景, 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肯定了人在世界中的根本地位。儒道两家的人本主义形成了中国古代主流的人性观, 即人是精神与肉体不可分离的存在, 是道德与功利的统一体, 人类生活的世俗性应该得到尊重, 同时人的道德本性应该得到开掘与满足。其中, 道家主张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处置中, 必须有全面性的自觉。儒家与道家的人本主义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品格, 并成为后来中国统战思想的原则之一, 也就是全面性的辩证法则与世俗性的文化精神。

第二, 情理和谐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目标。先秦儒家发现人的血缘之爱中蕴藏着可以成就人类伟业的精神资源, 但这种爱必须经过伦理的淘洗而升华为君子之爱——仁爱时, 这种爱才足以担负起社会建构的使命, 由此儒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道德功夫论, 它追求“真”情与伦理“实”理无间一体的境界并探索二者统一的修养方法, 这种追求情性之真与道理之真的精神成就了儒家优秀人士的诚信品质与极其感人的精神感染力。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 这种凝聚于政治家个体身上的精神魅力成为实施统战思想的精神武器, 建设情理和谐的社会也成为中国古代统战活动的道义大旗所在。道家并不否定情, 它否定的是“虚妄之情”, 要以道的自然性消解人类历史沉淀在我们价值判断中的骄情与妄想, 从而实现真情与自然之理的统一。儒道两家对情理和谐的内涵理解不同, 但其思想主题因为共同的生活世界而相近, 情理和谐的社会观与人性论成为中国统战文化独具特色的魅力所在。

第三, 求同存异的文明观。人本主义的人性观与情理和谐的社会理想使儒道两家形成了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观念。从同的方面看, 它们都追求和谐的世界, 因此在道家思想的逻辑中亦包含了大一统的政治可能性。但在这种求同之中, 他们又有着深刻的相异之处, 儒家追求基于道德自觉的伦理和谐, 而道家主张基于对“道”的理性认识下的自治和谐。也正是儒道两家对和谐内涵的不同认识, 他们在实践和谐的道路历经了不同的过程。由于对伦理属性的高扬, 儒家在社会生存与政治构建的实践中, 求同存异的主张则意味着个体人对伦理关系的充分内化, 最终实现伦理价值对人的完全占有, 趋同之理对

差异之情的宰制, 人类世界由此获得“大同”之善。但对道家而言, 和谐并非一种伦理性的善果, 它是万物是其所是的自在之态, 因此, 求同存异是在高扬差异性前提下的相互尊重, 相比儒家求同存异中的伦理独断性, 道家的求同存异有着更为开放的思想前景。儒道 2 种不同的同异观, 开启了 2 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从统战文化的视角看, 在中国古老的帝国专制统治中, 儒道思想皆为其所用。对汉帝国最高决策集团而言, 求同存异就是运用儒家或道家思想, 对社会的差异性力量给予重塑或尊重, 从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

儒道思想所开创的中国政治文化, 直接影响了汉武帝时代的统战思想与策略。

## 二、汉武帝的统战思想与策略及其现代意义

就汉武帝时代而言, 经历了汉初以来的黄老之治与文景时代的力量积聚, 西汉王朝的确已具备了有所为的客观条件, 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并未根绝。当时的政治难题, 对内而言是觊觎大宝之位的同姓诸侯, 对外而言是侵扰汉朝半个多世纪的匈奴。在非常时期, 同姓的诸侯王甚至与匈奴贵族勾结, 阴谋夺取政权。这种复杂局面使得汉武帝必须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采取统战策略, 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政治上的最大成功——实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理想。汉武帝的统战思想与策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以实现大一统中央集权作为明确而坚定的统战目标。从外交举措看, 为了营造西汉帝国的一统局面, 汉武帝放弃了汉初以来对周边小国放任自流的外交政策, 开始主动干预并将其纳入帝国的政治架构中。这体现在对待闽越国入侵东瓬与南越国的事件上, 汉武帝力排众议, 在建元三年与六年先后发兵, 不战而果, 成功地宣示了汉王朝在南越诸国之间的宗主地位。这种统战动机在后来汉武帝派遣使者开通西南夷活动中也表现了出来。他派张骞出使西域也是出于统战目的, 对匈奴进行大迂回的战略包围, 从而巩固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格局。

第二, 以社会下层作为统战政策的基石, 实施大一统的政治变革。汉武帝的政治变革是通过一系列的国家行动来实现的, 以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为历史契机, 旧的军功贵族、同姓贵族以及与旧贵族沆瀣一气的富豪成为被剥夺的对象, 士大夫与新军功贵族,

乃至庶民成为汉武帝统战的基石。汉武帝这种统战思想的变革有其儒家思想中变革观念的支持。例如,元朔元年汉武帝立出身庶人的卫子夫为皇后,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sup>[3]</sup>由此,汉武帝不仅发现了卫青、霍去病这样出身骑奴的人才,而且在军事上对他们委以重任,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大一统政治方针的坚定支持者。在汉武帝时代,游离于皇权之外的富豪大侠挟裹着先秦时代的自由风气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中心,汉武帝在天汉元年,“秋,闭城门大搜。发谪戍屯五原。”即汉武帝当时将地方上的富豪大侠迁出京城,驻于皇陵地区,实行管制。元朔二年夏,“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于茂陵。”<sup>[3]</sup>汉匈战争是一场将近30年的持久战,长期的战争使人民蒙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时出现的黄河泛滥与其他自然灾害,竟然使关东地区在元鼎元年出现了“饿死者以千数”<sup>[3]</sup>的现象。在此之际,汉武帝仍然进行政治性的巡察活动,一方面向地方诸侯与外夷显示汉朝中央的威严,另一方面对三老、孝亲、力田、弟敬之人分别给予表彰赏赐<sup>[3]</sup>,汉武帝甚至开放皇家林园和牧场让百姓狩猎以解饥馑。除此之外,汉武帝为了培植新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拉拢士大夫,如元朔元年下诏令丞相桑弘羊为博士置弟子员。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上说,汉武帝以下层阶级作为自己统战的基石是符合历史发展动向的,这些新兴的社会力量也的确为汉王朝的强大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全面性为统战策略的指导思想。汉武帝的统治思想尊儒而又杂用法家,可以概括为“霸王道”。为了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在统战策略上,汉武帝较好地运用了全面性的思想原则。全面性是一种辩证的世界观,也是儒道思想中的精华,这在汉武帝统战策略的以下3个方面表现了出来:(1)内外兼顾的统战策略。为了对诸侯王内部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也为了防范汉室诸侯王与匈奴内外勾结。汉武帝将内部削藩与对匈战争统筹考虑:对内颁布推恩令,对外进行军事打击,二者相互配合。(2)统战与非统战手段的配合。汉武帝在内政与外交上将二者娴熟运用,令人惊异。对内部的诸侯王,实行推恩令,并进行纠察打击,这使得大批下层贵族成为食封地主而感恩,又使得上层贵族失势,甚至被逼而自杀。对外的匈奴战争也是软硬结合,对主战的匈奴贵族进行纵深的毁灭性打

击,同时利用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策动其动摇军心归降汉朝,并给予其最大可能的政治优待。汉武帝对匈奴的统战策略有汉代人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其中发生作用,对汉代人而言,匈奴族与汉朝人都是华夏之苗裔,只是发展落后而不知文明社会的基本规范,因此他们与汉朝人是可以进行政治文化沟通的。班固记载匈奴就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处所在,不知礼义。”<sup>[3]</sup>在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sup>[3]</sup>“属国”是指“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sup>[3]</sup>。汉武帝深信,随着文化与经济的交融,存其国号的匈奴降人将最终被汉文化同化,汉武帝的这一信念已被历史所证实。(3)统战载体的多元化。统战载体是承载统战思想与策略的实践工具,汉代发达的物质文明是汉武帝实施统战的良好载体。就在汉匈战争最为紧张的时期,汉武帝也没有关闭汉匈之间的民间边境贸易。据文献记载,在标志汉匈战争开端的“马邑之战”后,“然匈奴贪,尚乐关市,蓄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sup>[3]</sup>,这种“网开一面”的政策是为了保持对匈奴的汉文化输出。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匈奴逐渐消失与汉文化差异,从而达到政治统战的目的。

汉代的精神文明对当时落后民族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对外的统战策略上,汉武帝利用落后民族崇拜汉朝文明的心理特点,将其上层贵族作为推行汉文化的突破口。当西域开通之后,强大的汉朝仍然用和亲的方式拉拢乌孙国,派遣公主与乌孙国王联姻。这种和亲政策一直作为汉朝外交的手段发挥了同化异族、传播汉文化的历史作用。

以汉武帝大一统政治格局所创建的统战成果是巨大的。如果总结其成功之处,可以看出,人本主义的儒道文化精神与辩证全面的历史观念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从汉武帝的统战思想与策略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统战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先进性。汉朝对其周边的统战行为是建立在汉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之上的。今天,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为了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我们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从而增强统战主体的文化吸引力。在思想文化方面,要在民主、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指导下,大胆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成果充实我们的统战思想。

第二, 以人为本, 创新统战载体。汉朝的统战手段不是宗教主义的文化洗脑, 而是人本主义精神引导下的物质流通与文化对话。汉朝物质文明与它所凝结的精神趣味成为统战的良好载体。从当今世界格局与国内环境看, 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经济发展是要务。在经济发展中, 要结合先进生产力建设, 重视核心技术与管理科学的创新, 使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为统战工作的良好载体。

第三, 重视统战与非统战手段的结合。汉武帝从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中得到启发, 他认为: 统战工作要统筹兼顾, 全面发展。这是道与术的结合问题, 也是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问题。当今世界的交流中亦有冲突, 要在增强文化吸引力的同时, 还要看到不同利益集团与不同阶级之间文化的对立性。非统战的战争手段也应成为统战的支援力量。

第四, 尊重历史潮流, 开辟统战新格局。汉武帝的早期政治功绩是在顺应新兴士大夫阶级与下层庶民的历史要求下取得的, 它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潮流。但其晚年君主专制的膨胀使他损害了自己的统战成果, 专制主义成为自我击败的致命根源。在今天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下, 发扬民主, 调动公民力量, 利用公民社会的能量, 将国家领导与公民自治 2 种力量结合起来, 开创统战新局面。

### 三、结 语

儒道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价值核心。儒道思想中世俗性的人本精神、情感与理性互相纯化提升的社会与人格理想、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观念、辩证全面的思想方法, 在今天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新时期无疑具有宝贵的现代价值。历史上, 汉武帝以儒道思想为指导,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尊重现实历史中人的世俗性要求; 相信优势文化在文明交往中对落后文明的塑造力量, 以优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为统战载体; 他重视情理和谐的精神感染力, 辩证运用战争与非战争手段, 实现了政治统战的终极目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高扬人文价值, 重视文化创新、尊重历史潮流的文化观与辩证全面的方法论应是当前统战工作的恰当原则。

#### 参考文献:

- [1] 高 亨. 周易大传今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8
- [2] 爱莲心. 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 内篇分析 [M]. 周炽成,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3] 班 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lassical thoughts and political united-front activities in Emperor Hanwudi's era

ZHANG 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6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the true value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n the guidance of present united-front work, this paper reviews the united-front activities during the Hanwudi time and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s activities: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the humanistic views of human nature, the sense of harmonious society so as to seek the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constitute of the resources. The success of Emperor Hanwudi united-front strategy tells us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oriented, respect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and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 of comprehensive world view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present united-front work.

**Key words** Confucianism; Taoism; Emperor Hanwudi; united-front